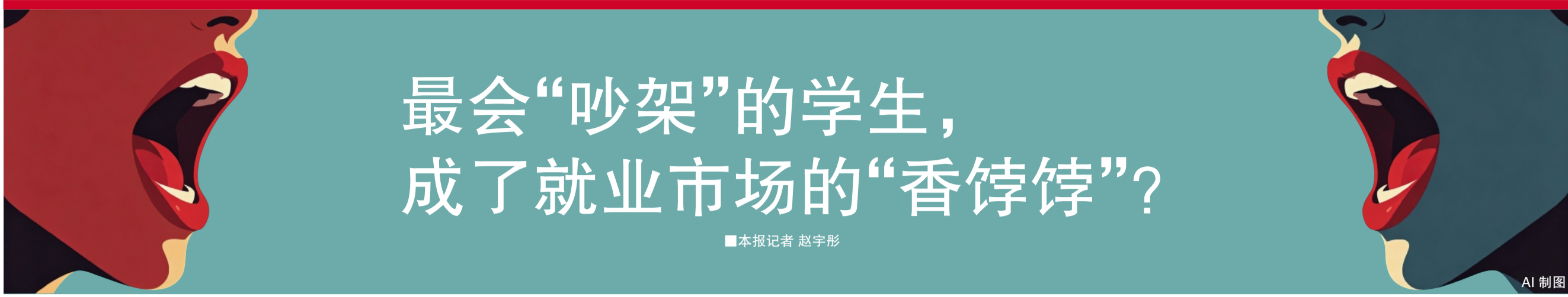


最会“吵架”的学生，成了就业市场的“香饽饽”？

■本报记者 赵宇彤



“月薪三万”“人工智能(AI)大厂疯抢文科生”“谷歌 DeepMind 设置首位 AI 哲学家”……又是一年毕业季，哲学系毕业生汪月的朋友圈被这些字眼持续刷屏。她看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专业：哲学。

哲学、抢手、高薪，几个看似毫无联系的词汇被绑定在一起。这个“低调”又古老的专业，被时代浪潮推到聚光灯前。

有人调侃，“哲学系的春天来了”；有人讽刺，“‘杠精’也能成为‘香饽饽’”；更多的人看热闹，“又是一个炒作的‘泡沫’”。

热潮之下，是真风口还是伪机遇？也许只有哲学系才懂其中冷暖。

误入哲学世界

2017年的夏天，蝉鸣比往日更加聒噪。汪月一次次地拖动鼠标，刷新着录取页面。空白、空白，还是空白。

她的心怦怦直跳，直到电话铃声响起。“查到了，被复旦大学录取了！”心里的石头重重地落下，激动之余，她险些错过后面的话，“被调剂到了哲学系”。

哲学系，汪月大脑一片空白。“哲学系要学什么？”她只有一个模糊的认知：高中政治课上的唯物辩证法。

事实上，阴差阳错与哲学结缘的人不在少数。在汪月的回忆里，当年她所在的哲学系，接近2/3的学生都是被调剂的。“大家都对哲学没什么认知。”

只有少部分学生在入学之初便展现出良好的哲学基础，他们往往在高中甚至初中就接触了哲学。

“上海市普通高中思想政治科目的必修课程，就包括经济与社会、政治与法治、哲学与文化等模块。”荣嘉骅说。兴趣是他选择哲学专业的初心。2019年，他考入浙江大学的人文科学实验班，又经过考查面试，如愿进入哲学专业。

2015年，正准备升初三的暑假，汤汤参加了上海季风书园举办的青少年哲学系列课程。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哲学。”由此，他对哲学的兴趣被彻底点燃。

刘擎、陈嘉映、程乐松……这些活跃在公共平台的学者，靠着扎实的学术功底、深入浅出的表达，为公众踏入哲学世界打开了第一扇窗。

尽管已有一批学者投身哲学普及事业，但面向大众的哲学教育资源仍然分布不均。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开展哲学教育的学校，更是集中在上海、北京等教育发达地区。

2022年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启动“相遇哲学——复旦哲学进中学”项目，在多所上海市知名中学内设立授课点；2024年，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正式签约并授牌成立“中学生哲学素养培养基地”……

与国外相比，我国哲学基础教育的尝试起步较晚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马修·李普曼就提出了“儿童哲学”，即将哲学应用于基础教育中的思维训练。

“什么是幸福”“什么是爱”“人为什么会

死”……在法国的儿童哲学启蒙教育中，孩子们围成一个圈，自由地思考、探讨、质疑，没有标准答案的束缚。而在高中毕业会考时，他们要通过的“第一关”就是哲学类考试。在德国，中小学普遍开设的“道德课”涵盖哲学知识以及世界观相关内容……

这些关乎生死、是非、自我、幸福与痛苦的人生命题，无法被“政治课”简单概括。

“哲学，究竟是什么？”身边的师友都无法给出答案，带着困惑与不解，汪月走进了大学校园。

哲学究竟在学什么

阅读、阅读，大量的阅读。这是不少人对哲学专业的第一印象，包括汪月。“本科大部分时间在学习哲学史，这就需要细读哲学原典，理解不同的哲学思想和观点。”

这也是哲学专业教育的“基本功”。“阅读理解能力是哲学专业训练的重要一环。”某985高校哲学系副教授郭亮告诉记者，这既包括哲学经典，也涉及前沿研究，“最终目的是准确地了解别人所表达的意思”。

这听起来容易，但要真正实践却困难重重。“读不懂，理解起来很困难。”2022年高考后，嘉元考进一所本校的哲学系，“不好读”的哲学原典成了她最大的困扰。

由于不同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往往存在分歧乃至矛盾，比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同一问题上给出了不同答案。“一个哲学家提出的观点，很快又会被另一位哲学家反驳。”嘉元说。

看似简单的文字背后，是不同哲学思想的相互碰撞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当不同哲学家、不同哲学思想“对话”的链条越来越长，阅读理解的难度也层层攀升。

这也促成了外界对哲学的误解：晦涩、抽象，“不说人话”。但这些偏见，哲学并不买单。

“任何学科的基础理论，都是对经验认识的反思和抽象。”郭亮表示，“物理学、天文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，难道就不晦涩吗？只不过很多学科的培养更侧重应用层面，‘抽象’‘晦涩’的观感就减轻了。”

“哲学专业的训练还非常注重反思和论证能力，不管同意还是反驳某一观点，都要有条理地论证表述。”郭亮告诉记者，而在阅读、反思、论证的过程中，离不开一项重要工具——逻辑。

逻辑，这是哲学学生的另一个“武器”。逻辑学，也是哲学专业的必修课之一。但要学好这门课，没有想象中简单。

“这是数学课，还是哲学课？”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命题课，刚上大一的汪月愣住了，数理逻辑、分析哲学，做不完的习题、理不清的推导，这难道是个“假”文科生？

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感受。“逻辑学更侧重严密的推理论证。”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后，汤汤发现，理科思维能力更好反而是一种优势。

哲学与自然科学，看似相隔遥远的两个领域，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作为解析几何的创立者，笛卡尔以“我思故我在”开创了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；牛顿在

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中指出，“哲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从各种运动现象来研究各种自然之力，而后再用这些力去论证其他的现象”；数学家罗素用数理逻辑分析语言、知识、形而上学问题……

这是另一个误解：哲学难道不是“纯粹的文科”？

“从学术分科的历史来看，文科、理科、工科的划分是服务于工业社会的，而不是基于理论本身的性质。”郭亮说，其实从个人能力发展的角度看，并没有纯粹的文科和理工科之分。

同时，这个科技创新驱动、急剧变革的时代，对哲学提出了更多要求。科技哲学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科技哲学的任务是理解科学技术的目标、运行机制以及社会影响，探讨其在人类认识和实践中的规范性地位。”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志强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科学假设是如何得到经验证据验证的、技术是纯粹的工具还是自主的系统、人类神经增强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是否在道德上是正当的……这些都是科技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“这就要求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通过各种方式学习、补充、精进科学技术知识。”胡志强说。

“有意识地生活”

汪月时常觉得，自己身体里出现了两个“我”。“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？”“最终目的是提升自己，不要被情绪影响。”当遇上烦心事，这两个“我”的争吵就更加激烈。汪月笑道：“这就是学哲学的‘后遗症’”。

事实上，这种争辩不局限于“我”。在不少人看来，哲学学生的“战斗力”确实不容小觑。

“学哲学有什么用？当然是更会吵架了。”接受采访中，哲学学生们纷纷调侃道。“杠精”“辩手”“爱讲道理”，这些被外界贴上的标签，他们能理解，却并不认同。

旁人眼里的较真，实际上是长年锤炼出的批判性思考与理性质疑。“最终目的是‘有意识地生活’。”汪月说，“批判不等于否定，而是带着独立思考去直面日常、审视生活。”

这也是哲学学习的目标之一。“哲学培养的是‘人’本身，而不是‘技能人’。”郭亮说，正如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石刻铭文“认识你自己”，你是谁、你想干什么、你与世界的关系，都是哲学诞生之初的追问。

而以学科面貌呈现的哲学专业，则背负了更多责任：人才培养、升学就业等。“每个学科都在努力培养适应社会、职业分工的技能人才。”郭亮说。

相较而言，哲学专业的学习还有独特的馈赠。“在现实与‘自我’之间，永远保留着一个缓冲区。”在郭亮看来，这不仅能纾解生活压力，也能留出喘息、探寻人生意义的余地，“两个‘我’的对话也是如此。如果一个人停止了对生活的思考和追问，最终会丧失自我”。

因此，哲学其实是一段向内求索的旅程。“想寻找一个具体的答案。”这是多数人选择哲学的初衷，嘉元也是如此。但当她真正走进哲学时才发现，这里最不缺少的就是答案。

“关于人生、生命，或者种种困惑，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看法。”嘉元找到了非常多的答案，但这也意味着，这些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，“相反，这个过程锻炼了反思和质疑的能力，我更知道该怎么去思考、理解世界和自我”。

哲学生，不再神秘

“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。”2024年，一段脱口秀风靡全网，舞台上的主人公正是毕业于哲学系，台下一阵哄笑。

哲学生，真的找不到工作吗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发布的《2024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》显示，教育机构、党政机关、其他事业单位、民营和国有企业，都是其毕业生的主要去向。

而在巨变的时代浪潮中，更多领域朝哲学生抛来了橄榄枝。

荣嘉骅选择了游戏行业。他喜欢游戏，也尝试参与游戏创作，从剧情架构、角色设定到文本撰写，帮助叙事团队完善游戏整体的世界观和各情景任务。

“一方面是设计人物角色，比如写人物小传、人物卡牌等，推动其与世界观深度绑定；另一方面是设计任务流程，不同任务如何推进情节发展，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人物如何对话、合作等。”他有3段相关实习经历，编写了40多个情景任务脚本、80余个NPC(非玩家角色)对话脚本。

哲学的专业背景，让他更加明白怎样设计一套逻辑清晰、抓人眼球的游戏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小众选择。火爆全球的游戏《魔兽世界》的主创之一格雷格·斯特里特，就曾在麦克丹尼尔学院获得生物学与哲学双学位。

相较而言，阿良的步子则迈得更远——从生物学专业“跨行”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他，开始尝试哲学创业。“哲学本身可以被应用于实践，或它理应如此。”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，“哲学要参与对社会问题、对生存意义、对时代背景的种种追问，并以思想和作品给出解决方法。”

而他的目标就是将哲学本身具有的价值，转化到具体的产业、商业活动中。他同样选择了游戏，但不是直接进入游戏行业中，而是尝试把哲学本身带入到游戏中，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游戏，借助游戏的形式来回应当哲学问题。对他来说，从事游戏其实也是在从事哲学，延续哲学的事业。

在阿良看来，如果哲学教育只是培养了一群理论的研究者，那它不过是“从理论出发，又走回了理论”。

“哲学本身带有批判现实的维度，而现实问题最终需要通过行动和实践去改变，而不能停留在文字层面的理论解释。”在他看来，无论是独立探索还是商业行为，都需要落到实践层面，“这才是哲学的‘完成’”。

不只是心灵“解药”

“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”“哲学专业缺少直接对口的行业岗位”……这不仅不是大多数哲学

生的焦虑，也是多数人文学科面临的共同困境。

“文科就业难的现实困境，逐渐激化成了‘文科无用论’的表述。”郭亮说。然而，在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冲击下，专业的壁垒正在被打破。严密的逻辑、质疑的态度、清晰的表达，更多领域看到了哲学学生的闪光点。同时，时代变动的不确定性也让更多人转向哲学，寻找心灵“解药”。

在书店的畅销书柜台，总能看到挂着“哲学”二字的图书。“年轻人的鸡汤”“越读越清醒”“治愈你的焦虑”……这些推荐语精准地击中当代人的迷茫与困惑。

“快节奏的生活里，青年人需要一个心灵出口。”在郭亮看来，这些压抑的心灵需要依附于外在的、权威的话语体系，“很多学生会觉得，自己的感受不被重视，而某个哲学思想恰好能帮他们抒发心声”。

实际上，哲学不只是心灵“解药”。相反，关于哲学的“学术黑话”盛行，恰恰暴露了哲学科普的不足。

“目前哲学科普分为3个层次，一个是具有专业背景的学者，或者说‘学院偶像’在公共平台上的自我表达，这也是公众最常见的类型。”郭亮说，另一个是学术运动的自我拓展，例如专业的哲学博客、学生们主动发起的“斯坦福哲学百科翻译运动”，“都是出于对哲学的热情，为更多人了解哲学提供一个平台”。

然而，面向更多有困惑但没有哲学基础、短期内无法系统学习专业哲学内容的人群，“民间哲学”成了他们慰藉心灵的首选。但某种程度上，一些缺乏学术内涵、偏激片面的表达，反而会加深错误认知。

“我们希望的哲学科普，能在保持学院底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。”郭亮说，这也是哲学应当承担起的社会责任。

一个有哲学的社会和一个没有哲学的社会，有什么区别？“一个有哲学思想的社会，就会对当前的处境有所反思，并尝试作出解释。”郭亮解释道，也许这无法对社会规范产生直接推动力，但并不能简单粗暴地界定哲学是无用的。

而随着以AI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发展，哲学也有了新的机遇和挑战。

“AI 奠基与发展的过程一直都有哲学的参与和哲学家的贡献。”胡志强告诉记者，诸如什么是智能、什么是能动性、AI 是否已经或有可能有意识、AI 在认识论上的地位如何、在什么条件下 AI 能够成为道德主体等问题，其中有些是哲学家长期讨论的，但 AI 为之提供了新的维度，有些则是传统哲学讨论中尚未触及的。胡志强指出，“这赋予哲学在人类关键时刻的重大使命”。

而在更广阔的天地，哲学的发展也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。除了纯粹的哲学理论研究外，现实也不断提出新的问题。

“例如，物理学对微观世界的深入、合成生物学引发对生命概念的新争议、神经科学开始触及人类心智中的意识地带等。”胡志强说，“归根到底，哲学发展的动力来自回应其他理智和实践活动的需要。”

(本文中汪月、嘉元、阿良、汤汤、郭亮均为化名)

AI 时代，统一智能平台将是大学运行的“基座”

——专访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、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胡清华

■本报记者 陈彬

不久前，一场以“人工智能(AI)+教育”为主题的改革创新工作推进会在天津大学举行。作为会议的“重头戏”，该校正式发布了《天津大学“人工智能+教育”改革创新行动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)，并同步推出了《天津大学人工智能应用师生行为指南》，以期依托新工科教育的深厚积淀，打造一个“师-生-AI”协同共生的智能教育新范式。

当前，AI 技术快速迭代，并多维度融入高等教育。高校教育模式变革已成大势所趋。然而，变革有“主动”与“被动”之分，此次天津大学显然选择了前者。

这份选择既需要勇气，也需要对目标与措施有更清醒的认识。在这方面，该校有何种考虑，又想打造怎样的智能教育新范式？对此，《中国科学报》专访了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、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胡清华。

大学内部不可“各自为战”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近年来，AI 的全面普及正猛烈冲击高等教育，你认为这方面的表现有哪些？

胡清华：AI 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层次、立体化的，其中影响比较深刻的，我认为有以下领域。

首先，AI 重塑了大量岗位的能力标准，人机协同求解复杂问题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猛增。这倒逼高校持续调整专业设置和能力结构，把 AI 素养、跨学科问题求解能力嵌入培养方案。

其次，过去教师是知识权威，教材和教师是

知识唯一的来源。但如今，学生随手就能通过大模型获得知识，学生“人在教室、心不在课堂”现象非常普遍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单向知识灌输转变为启发式教学和探究式学习，并重构课堂，调动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性，而不是让课堂沦为知识点复读。

最后，在研究生培养环节，大模型虽然能短期快速提升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效率，但长期看却有可能削弱学生逻辑推演、批判性思辨等核心能力，甚至让其丧失独立钻研的韧性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针对上述问题，国内高校采取了哪些措施，你觉得《行动方案》有哪些特点？

胡清华：近年来，许多高校都在探索教育与 AI 融合的路径，但多处于“零散试水”状态，不成体系。此次方案中，我们希望推进 AI 与教育教学的全要素融合、全过程贯通和全场景覆盖，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。

具体来说，我们提出要建设能提供基础数据和通用 AI 能力的统一智能底座，并打造若干学科大模型融合助教、助学、助研、助管的多元智能体，应用服务于教学科研典型场景，从而构建出一个“1+X+N”的教科研智能平台——1 个智能基座、X 个学科垂域大模型和 N 个智能体。

21 世纪初，我们将大学搬上了互联网，建设了大量数字资源平台，并提供了便捷的网络服务平台。这些举措极大地便利了师生，提高了教育、科研效率。如今，统一的智能平台将会成为大学在 AI 时代运行的“基座”。我相信再过几年，我们的教学、科研、学生管理、行政服务都要依托这套体系运转。

比“翻转课堂”更进一步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在教学层面，《行动方案》提出构建“师-生-AI”三元融合教学模式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模式？

胡清华：长期以来，大学课堂上的典型教学模式是“教师讲，学生听”。但由于教师资源有限，虽然教师会通过作业和测试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，但是教与学基本处于开环状态，教师很难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，无法做到大规模的因材施教。

为改变这一状况，教育界曾提出“翻转课堂”模式，教师提前录制教学视频，学生课前观看，课堂上由老师答疑解惑，引导学生学习。但由于缺乏智能手段，该模式下师生还只能在相对固定的空间交互，虽然能部分解决教学与学的问题，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。

相比之下，“师-生-AI”三元模式依托大模型与智能体、数字人、虚拟现实等新技术，实现了全时、全域的教学互动，相较于“翻转课堂”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
具体来说，借助各类 AI 工具，三元模式可以搭建起一个全天候、无空间限制的学习平台；AI 可以在课前、课中、课后协助教师开展教学活动；学生在 AI 辅助下自主完成基础知识学习，教师将课时留给小组研讨、项目攻坚、思路辩论。学生在课下可随时与大模型和智能体交互，智能系统自动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，针对薄弱环节推送个性化学习内容，形成闭环学习链路。

能各类教育场景，同时规范相关技术的应用。

以我所在的人工智能学院为例，短短数年间，已有相当数量的 AI 基础课程教学内容过时。为此，我们大幅压缩了某些必修课程，将其转为选修模块，同时建设能体现技术前沿发展的课程。学生通过选课机制推动陈旧教学内容退出课程体系，倒逼教师持续更新教学素材，甚至开设新课程。

在学校层面，我们以专项资金引导推动教师向 AI 融合方向发展，同时建立面向教职工的长效 AI 素养提升机制，开设常态化更新课程，覆盖新模型、新工具、新规范规范，要求全体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理念，持续跟上技术变革步伐，避免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脱节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认为国内高校在“AI+教育”方面的实践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？

胡清华：不同学校的发展历史、学科定位乃至 AI 能力水平不同，针对“AI+教育”的实践也不能千篇一律，但其中仍存在一些共性特征。

比如在推进相关改革时，学校必须做好顶层设计、系统推进。避免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及零散试点无法形成规模化效应等问题。在这方面，有些学校只打造几门样板 AI 课程，院系各自采购工具，资源割裂，这都会造成资金、算力、技术的重复浪费，还会再次形成数据和智能孤岛，无法实现全校教学、科研资源的高效流通共享。

因此，要优先搭建校级统一智能资源基座，再分层向各学院落地细分应用。此举能大幅减少重复投入，哪怕是算力规模有限，集中统筹的使用效率也远高于分散建设。

此外，我们发现，以 AI 赋能项目式教学可以作为“AI+教育”的重要突破口。在项目式教学中，传统实体实训设备采购、维护成本极高，普通院校资金压力大，但借助虚拟现实、大模型数据分析等技术，便能够低成本搭建项目场景。在天津大学，我们不仅在工科全面推广这种模式，而且在人文社科、经管商科也落地 AI 赋能的探索式项目。学生的实践体验得到显著提升。